

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对举办城市的影响与应对

——基于奥运城市东京的历史经验

冯雅男,毕天杨

(北京体育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致使东京2020年奥运会暂定推迟一年举行。作为深受疫情与奥运会延期影响的奥运城市东京,回顾前路是为未来探路的方法之一。比较并剖析1964年、2020年奥运会背后,作为奥运城市的东京以举办奥运会来促进其发展的主要目标、主要矛盾、所依托的国内外经济与政治环境、与国际奥委会及奥林匹克大家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这四个层面,认为奥运城市的综合治理应更加可持续,办奥认识应更加理性,与国际奥委会及奥林匹克大家庭利益相关者之间应更加团结。

【关键词】:东京2020年奥运会;奥林匹克运动;东京1964年奥运会;奥运城市;城市发展

【中图分类号】:G811.111、G81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0)03-0019-08

DOI:10.15877/j.cnki.nsic.20200604.003

2020年3月24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东京2020年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共同宣布,第32届夏奥会因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延期。疫情及该届奥运会延期,对各方各面都产生了影响,首当其冲的便是申办与筹办该届奥运会、渴望再次迎接圣火的奥运城市东京,因此,它该如何应对这次危机?

研究从东京举办1964年、2020年奥运会均以促进城市发展为切入点,比较分析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奥运城市东京发展的主要目标、主要矛盾、所依托的国内外经济与政治环境、与国际奥委会及奥林匹克大家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探讨面对疫情与奥运会延期,奥运城市东京如何应对才能继续顺利办赛,再促发展。

1 借力东京1964年奥运会与东京2020年奥运会:奥运城市东京发展的主要目标

1.1 东京举办1964年奥运会以加速城市重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东京严重受损。在日本国家支持下,东京举办1964年奥运会以加速城市重建,其主要特点是城市的全面扩张、系统升级、遗产拓展、现代化建设。

就全面扩张来看,从不给奥运会配备任何专用场

地,到只新建一座各项目拥挤一处的综合体育馆,再到兴建不同体育场馆和奥运村,奥运城市的奥运空间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单一体育建筑到局部的奥运社区。东京举办1964年奥运会促进的建设范围,以整个城市为单位:涉谷—代代木—表参道区域、有乐町—丸之内—日比谷—银座区域、九段下—水道桥—神保町区域等东京市内,因奥运会而加速建设^[1],邻近的八王子、神奈川、埼玉、千叶和长野等承担部分赛事的东京都外圈也受到拉动。东京地理版图因奥运会被注入活力。

就系统升级来看,过去的奥运城市,从没有觉察到奥运会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到围绕奥运会完成体育设施的完善和少量、部分的城市系统的升级。东京围绕1964年东京奥运会实施了城市各领域的提升。东京新建、改建和临时准备的场馆有33个(15个新建);投资立体分级交通网络(东海道新干线、大都会高速公路、名神高速公路、羽田空港等);发起新的供水、排污、绿化、河道、公共电视等工程^[2],城市系统升级提速,“使不同计划同步集中于一个时期,是以奥运会为契机的”^[3]。

就遗产拓展来看,以往的奥运城市,从对奥运会兴趣索然,到沉浸在欢乐和平的节庆氛围,受到奥林匹克

收稿日期:2020-05-11

作者简介:冯雅男(1990-),女,山西太原人,博士生,研究方向:奥林匹克运动。

精神的鼓舞,既是感性抒发,也是懵懂体验。东京有意识地将东京1964年奥运会带来的非物质方面的内容,进一步制度化、遗产化。为展现新面貌,市民主动接受新生活方式,如自发学习外语,东京大部分外籍人员受邀、受雇教授外语,十多岁的少年都被称为老师^[4],有东京1964年奥运会参与体验的人,体育参与率比其他世代更频繁^[5]。奥运会留给东京的远不止场馆。

就现代化建设来看,东京真正符合西方文化中“现代标准”的城市化进程,是在二战后的重建,尤其在东京1964年奥运会前后。城市建筑表征是可读的“语言”,为东京1964年奥运会新建的代代木国家体育馆、东京体育馆、驹泽体育馆等,与皇居所代表的日本传统建筑风格相异,设计深受柯布西耶领衔的现代建筑运动影响,此外,“现代化”的语义还通过多种符号体现出来,特定阶段的符号被赋予了象征意义,摩天大楼、立体交通都被看作现代化的象征。1964年东京奥运会在奥运史上首次设计和使用了描述运动项目、生活服务等内容的象形图标,用跨越语言障碍、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图形语言,代替本土的、原生的交流形式来发挥作用,本身就是对现代化的隐晦回应。

由此可见,1960年代的奥运城市东京,希望借力1964年东京奥运会“拨地而起”,清理战争废墟,全面重建,加速前进,以迎头赶上,塑造一座亚洲乃至东方的现代化都会。

1.2 东京举办2020年奥运会以助力城市更新

全球化竞争及资源有限性使东京寻求优化发展。在日本国家支持下,东京举办2020年奥运会以助力城市更新,其主要特点是城市的重点开发、结构调整、优质遗产持有、可持续发展。

就重点建设来看,21世纪的东京希望建设城市分中心(副都心),进行功能复合的超高强度建设,实现向上、紧凑、综合化的发展。东京2020年奥运会推动了品川开发项目、品川站和JR山手线的品川—田町段的高轮网关新站;以环状2号线(新虎大道)为轴的虎之门新城、东京都和港区以及虎之门 Hills 新站的发展^[6]。这两大项目区域,都是东京城市更新重点建设的代表,在东京2020年奥运会前经历了长期的、不断的建设,如今又因东京2020年奥运会而成为焦点。

就结构调整来看,21世纪,东京希望优化空间结构的同时优化交通结构,在原先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TOD模式)为主和交通大动脉确定的基础上,提高各分支线路的“微循环”,同时变革交通方式。东京2020

年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将“利用公共交通”“利用燃料电池车辆”“发展无障碍设施”作为东京2020年奥运会促进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分目标^[7],为此,推进氢能汽车的应用和近年来逐步导入的LRT(Light Rail Transit,下一代有轨电车)系统等项目^[8],以求为市民的出行提供便捷、灵活、绿色、具有人性关怀的服务。

就优质遗产来看,21世纪的东京更加注重环境、生态、历史、文脉、人居、美感的保护,确保长期创造和持有优质的社会资产。例如,东京希望塑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舒适的城市环境,而东京2020年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希望通过举办奥运会践行的可持续发展分目标之一,是“City within Nature and Nature within the City”(自然中的城市与城市中的自然)。以奥林匹克圣火台为中心,半径1.5km内包括7个新建奥运场馆的临海副都心,是东京利用2020年奥运会力图创造的优质遗产之一。该区域实施热量管理,推行“氢能之城”计划,奥运场馆采用过滤设施利用雨水、再造水,奥运场馆与周边绿地、树林、物种与海洋交相辉映,以发展体育与生态、自然的融合^[9],被誉为“象征都市与体育融合的奥林匹克主空间”^[10]。

从可持续发展来看,在21世纪东京希望响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个目标,推动多样化的可持续发展,让东京成为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榜样。社会平等与包容,是城市发展更高层次的目标,世界各个城市都为此经历了漫长的努力过程。为此,借力东京2020年奥运会的举办,东京2020年奥组委率先将“人权、劳动与公平的商业实践”作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五个主目标之一,并在其可持续发展计划的第二版中制定了明确政策,确定了在举办奥运会过程中可能造成人权风险的三个关键领域:日常/工作场所、奥运会/赛事场所、采购/供应链,并积极处理与应对这些风险^[11]。

由此可见,21世纪的奥运城市东京,希望借力东京2020年奥运会促其城市“精雕细琢”,在成为世界四大超级城市后,巧妙更新,有的放矢,以合理发展,巩固全球金融、产业、文化中心的位置和能级。

2 借力东京1964年奥运会与东京2020年奥运会:奥运城市东京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

2.1 东京1964年奥运会背后奥运城市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

早期奥运城市无法指望本身组织架构还没有真正成型的国际奥委会予以举办范式,为奥运会怎么组

织绞尽脑汁,“办下来”是对奥运会接续和奥林匹克运动推进的可贵支持。顾拜旦曾疑惑:为何当时(20世纪早期)斯德哥尔摩、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稍“小”城市举办奥运会更加顺利,反而伦敦、巴黎这样看似颇有能力的超大城市,与奥运会互动效果欠佳^[12]?实际上,当时的奥运城市并没有觉察到奥运会能促进城市更大范围、更深领域发展的工具性,且较“小”城市无论规模、规划、治理及社会的问题都不太突出和尖锐,早期举办奥运会的目的更简单,彼时新生、弱小的奥运会的体量,也使两者更为契合。

随着奥运城市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奥运会“身躯”越来越胖,奥运城市举办奥运会的动机越来越宏伟、复杂,举办奥运会过程中暴露出的城市发展的矛盾就越来越多。东京围绕1964年奥运会进行城市重建时,奥运城市发展中表现最突出的矛盾是城市发展中过度注重生产的、物质的、外在的内容,忽略了生活的、非物质的、内在的内容,这也是希望加快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国家 and 城市的“通病”。不不同步、不相匹配的物质建设的“快”,与非物质建设的“迟”,由于时代局限性、对城市发展理解的局限性、对奥运会认知的局限性,以及当时国际奥委会职责和行动的局限性,在以东京为典型代表的20世纪中后期的奥运城市的举办实践中时时上演。

例如,为保证东京1964年奥运会召开前建设如期完成,日本及东京当局采取了一些不恰当手段“速战速决”:抬高税收、公开羞辱、雇佣雅库扎势力进行恐吓等,迫使有很强土地观念的市民迁居^[13],再如东京重建之初,放弃了许多城市绿化计划,但获奥运会举办权后,政策发生更改,本就应该存在的城市自然生态的规划因奥运会才重新得到机会落实^[14]。又如,随着1964年东京奥运会加速的城市重建,东京的历史感遭到破坏,江户时代以运河和水道为纽带和分界的“水城”东京,其传统美学被横七竖八的公路、轨道、建筑割裂^[15],日本道路原点标识和近代建筑瑰宝的日本桥就是一例。

2.2 东京2020年奥运会背后奥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

21世纪,东京持续不断的城市更新,代表着奥运城市不断向可持续发展迈进的信心。自1992年联合国在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21世纪议程》、1994年国际奥委会正式发起可持续发展倡议,自悉尼2000年奥

运会始,举办奥运会并将其融入自身可持续发展中,成为奥运城市的主要目标,包括悉尼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官方报告在内,之后历届奥运会举办城市的官方报告中,“可持续”“可持续发展”在奥运会官方报告中出现的次数频频增多。

奥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已近二十年。如今历届奥运会都以可持续发展的新设计、新技术、新手段、新措施为亮点。然而,奥运城市的具体作为还是经常被诟病“不可持续”。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旨在去弊革新,“做到”与“做好”,“完尽”与“完善”客观上存在漫长距离,另一方面,如果奥运城市举办奥运会的过程中,将可持续发展停留在器物层次的标新立异,无法坚定决心利用奥运会的举办来持续激发城市观念、政策、制度、机制和管理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则奥运城市将会错失深化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机遇。例如,有的奥运城市在奥运会申办、筹办和举办时,展示先进通信技术、转播技术、环保材料的使用,但后奥运时期,其奥运遗产却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这种反差说明奥运城市没有很好地落实可持续发展。盯着可持续发展的“表”与“皮”,忽视可持续发展的“骨”与“里”,是当前奥运城市借助奥运会促进城市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矛盾之一。

新国立竞技场建设方案的变更风波,是一个好的观察点。最初选用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伊拉克裔英国建筑师扎哈·哈迪德的作品,占地面积113万m²,建筑面积29万m²,近3倍于伦敦2012年奥运会主体育场,造价达21亿美元,创奥运主场馆最贵记录,夸张、超前、先锋的外形,倾向于建设成世界地标。评委会阐述入选理由:“它体现了日本想传达给其他国家的讯息,该体育场将成为世界体育圣地”^[16]。决定宣布后,包括槇文彦、伊东丰雄、隈研吾、藤本壮介、矶崎新在内的百位日本建筑学家、规划师、设计师联名签署请愿书,上表忧虑,民众反对意见更加激烈。九十二岁高龄的日本建筑界国宝级人物、同为普利兹克奖获得者的槇文彦认为,该作品体量、规模、高度过于夸张,超越实际需求,巨物感、凌驾感、突兀感迫使周围的明治神宫、公园绿地、商场民宅等建筑因其视觉效果而“消失”,太空飞船的造型与传统日本美学格格不入,也与周围“城市绿肺”的安静祥和南辕北辙,该建筑方案中最高处达70m,并非出于实用,而是为满足任务书要求的极值^[17]。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新方案

“森林体育场”取而代之。举办奥运会背景下的城市更新,与一般情况下的城市更新有一定区别。比如,奥运会带来媒体的瞬间聚焦,可能让奥运城市大兴形象美化工程;主要以城市为开发主体的项目,可能因奥运会举办转移到更高的行政层次来主导。旧方案的出现如此特殊,与举办奥运会的各种复杂目的、利益交织不无关系。这也反映出奥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矛盾并不在物质建设、科技实现上。

3 借力东京1964年奥运会与东京2020年奥运会:奥运城市东京发展依托的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

3.1 东京举办1964年奥运会所处的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

从系统论的层级关系来看,城市位于国家之中,国家位于全球之内,小层次无法脱离大层次而单独存在。奥运城市举办一届奥运会,包括其借助奥运会的举办促进城市发展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国际等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些影响中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更为重要。

东京1964年奥运会带来的“奥林匹克景气”(オリンピック景气),寓于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暖流中,从而有利于东京借助举办奥运会来促进城市发展:国内方面,日本的新经济改革在《日本经济重建的基本问题》(1946年,后为《日本经济发展计划》)对经济优先发展的正确判断、《中小企业等协同组合法》(1949年)对日本大企业及中小企业互补崛起的安排、《关于产业合理化决议》(1949年)对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日本收入倍增计划》对消费的刺激下不断推进。“奥林匹克景气”(1961—1964年)是“神武景气”(1955—1957年)、“岩户景气”(1958—1961年)、“伊奘诺景气”(1965—1970年)构成的日本经济恢复、兴盛的连续过程中,环环相扣的一环。国际方面,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奥运周期(1958年申办成功)嵌套在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重建恢复后,连续十年的增长繁荣期(1960—1970年),日本得到远超西欧国家的来自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注资(1950年后),受到了“天佑”“特需经济景气”(朝鲜战争)的带动(1950—1957年),利用了中东石油增产引起的能源革命(1950—1970年),还因在《旧金山和约》(1951年)后加入了国际劳工组织(195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52年)、世界银行(1952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1953年)等国际组织并签署《关税及

贸易总协定》(1955年)而得到大批贷款。

东京1964年奥运会所处的的是一个相对对立的世界。伴随日本经济繁荣时代的吉田茂内阁、池田勇人内阁主要走经济路线,政治上只求日本以正面形象立于国际社会。历史传统中国家与城市及市民的关系、战后国家主导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重建目标的一致性等因素,使东京举办1964年奥运会不仅肩负了国家的经济诉求,更满足着国家的政治诉求,也得到了全体国民的认同和支持。

3.2 东京举办2020年奥运会所处的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

日本“体育日本新闻社”编辑委员、作家小川胜在分析东京2020年奥运会组织委员会推进会议上分发的官方文件后,提到“取得经济效益”和“向世界展示、向世界发出……信号”的表述反复出现^[18]。

东京2020年奥运会能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实际要仰仗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外部的国际经济走势。日本的经济在历经1970年代石油危机、签订《广场协定》及泡沫经济破裂后,从1990年代开始,有所衰退,近年来稍见回温。当前日本经济能够指望的主要驱动力,是全球经济的增长和外部需求的扩大,尤其是美国、中国和欧洲^[19]。疫情暴发后,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退休高级研究员韦爱德介绍,全球经济专家达成的初步结论是:全球化经济依靠的纽带是各种资源和产品的流动,疫情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从中长期看,可能带来“经济去国际化、各国应对政策措施混乱化、政府需大量支出以救济解困、危机在连续的经济复苏与疫情间长期震荡、逐步建立一种‘新异常’等后果^[20]。此外,许多西方学者对奥运经济影响的研究发现,奥运会对经济的促进,大多是“奥运周期型”的,其促进的经济增长点不是一概全有,例如刨除奥运会门票和比赛场馆的游览收入,举办国本地其他景点的旅游收入可能不升反降^[21],且奥运会的经济促进作用的最优选和最大化,还要看是否能尽量让投入减少且收入增多,做好“减法”“加法”。

东京2020年奥运会处于的是一个多级化发展的世界。中曾根康弘内阁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延续至今:“面向21世纪,在日本人一致同意的前提下,我们要大胆触动过去意见纷纭和回避触及的问题,重新形成统一看法,促使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前进!”^[22]“向世界展示、向世界发出

……信号”的主要内容,既有文化、科技大国的形象,更希望有政治大国的形象。而在追求大国形象的过程中,正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在演讲《暧昧的日本的我》中所说:“我无法像26年前同胞川端康成一样,说出‘美丽的日本的我’。我认为,日本现在仍然持续开国12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并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间……把国家和国民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多样化和表面化”。^[23]

4 借力东京1964年与2020年奥运会:奥运城市东京与国际奥委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

4.1 东京举办1964年东京奥运会促进其城市发展:国际奥委会并不关心,其他利益相关者介入有限

1960年代开始,奥运城市围绕奥运会展开更多大动作、大手笔。仅次于顾拜旦和萨马兰奇主席任期的、执掌帅印长达20年之久的布伦戴奇主席,以及后来的基拉宁主席,都认为奥运城市的唯一任务,是承担好奥运会比赛的组织,奥运城市可以建设一些服务于选手优异成绩创造的必要的体育设施,但奥运城市的其他事情与奥运会无关。布伦戴奇主席曾批评1968年格勒诺贝尔冬奥会,认为其巨大的城市投资难以理解:“法国,花费2亿4千万美元在格勒诺贝尔冬奥会上,当你想想这些投入是给一个十天的业余体育运动时,某种程度上根本不成比例!”^[24]基拉宁主席在听到彼时德国奥委会主席威利·多姆质疑慕尼黑1972年奥运会奥林匹克体育馆建筑风险,请求国际奥委会帮助时,以“这等工程技术上细枝末节的小事,不足挂齿”为由,断然拒绝,并玩笑意味地提醒后续奥运城市的考察者们:“小心别陷入建筑事务的多虑症中,例如思考慕尼黑体育馆房顶那种小事”,后来慕尼黑1972年奥运会确实在建设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国际奥委会也试图避免发表任何评论^[25]。

此外,虽然罗马1960年奥运会之后,举办城市组织委员会开始向媒体收取一定电视版权费用,也与一些赞助商开展了合作,但国际奥委会较少插手,从中得到的资金也非常有限,这些行为停留在举办城市组织委员会。各届奥运会各行其是,总体程度较轻,温和而带有实验性质,在还以公共财政支出为奥运会举办、围绕奥运会举办开展城市建设的时代,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介入相对有限。

4.2 东京举办2020年奥运会促进其城市发展:国际奥委会逐渐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目的复杂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成功试水、1985年正式启动的奥运会商业化改革。对奥运城市与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大家庭其他利益相关者形成新的关系而言非常重要。第一,赞助结构形成。国际奥委会“借助”(此为Susan Brownell教授的观点,源于1988年国际奥委会为使洛杉矶1984年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和美国奥委会同意让出全球赞助商模式的拥有权,后两者宣称其创造了全球赞助商模式)而非创造了存在竞争机制的同行业遴选的、排他性的全球赞助商模式和媒介版权销售模式。第二,收入分配结构形成。国际奥委会有权分配来自全球赞助商和媒介版权的收入,给国家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及举办城市组织委员会。国内及地方性的企业赞助、商品收入等归举办城市组织委员会所有。第三,签订具有法律效应的合同。国际奥委会除与赞助商、媒体等签订合同外,更要求举办城市政府、举办城市组织委员会与之签订《举办城市合同》(Host City Contract)、《举办城市合同运营要求》(Host City Contract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等。

赞助结构形成、收入分配结构形成、法律效应合同的签订,承认了多种利益目的之追逐在奥运会之中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奠定了包括更有权力的参与方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网络;进一步加剧了利益优先顺序的不同,从而造成了各方、各处矛盾的频频发生和不断升级。其设置存在一些问题:至今每轮TOP奥林匹克营销周期中,美国跨国大企业席位超一半以上,至今每届奥运会媒介版权资金注入中,北美广播公司的投入比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总和还多,至今每届奥运会收益分配时,国际奥委会都要给美国奥委会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奥委会的分红,这源于1988年美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签订的一份“永久性质的合同”,这是美国奥委会预算的主要来源。由此可见,国际奥委会面对的是奥运会主要为西方世界和资本利益服务的事实。国际奥委会与举办城市签订的合同中,国际奥委会要求举办城市遵守的责任、义务等,远远多于举办城市能以法律形式得到的恩惠(此为Susan Brownell教授的观点)。2013年东京被选为第32届夏奥会举办城市后,由东京都政府(TMG)、日本奥委会(JOC)和国际奥委会(IOC)共同签署了长达83页的《举办城市合同》(Host City Contract 2020),其中在“Termination”(终止)

一节中,国际奥委会列出其有权基于多种原因终止比赛,如战争、内乱、抵制、有任何合理理由相信奥运会参赛者的安全将受到任何原因的威胁或危害时、奥运会没有得到庆祝时等;且规定:举办城市政府、举办城市组织者、举办国家奥委会“放弃任何形式的赔偿、损害赔偿或其他赔偿的要求和权利”。即使得到国际奥委会远比其给有权力的体育组织少得多的分红,即使还有举办城市组织委员会与国内企业签约的赞助费、门票、特需经营商品的收入,即使有国家的支持,面对深患“巨人症”的奥运会,奥运城市依然要负担沉重费用,费用中相当部分来自税金。

5 东京举办1964年、2020年奥运会促进城市发展的启示:疫情及奥运会延期下东京如何应对

5.1 奥运城市的综合治理应该更加可持续

奥运城市对奥运会的认知不断发生着变化。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奥运城市对奥运会的认知从“一种类似阿尔玛大街跑马场的演出,或类似伦敦奥林匹克歌舞厅的杂耍”,进步到“一次需要认真对待的国际体育赛事”^[26]。二战后,奥运城市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奥运会的能量早不是它初生和初步发展时期那样的有限而单薄。

1960年代,在工业立国和经济为先的背景下,受工业社会福特主义主导,踏上城市福特主义发展模式的东京,开始了改头换面的城市重建,处于高速成长阶段的东京,利用1964年东京奥运会,城市发展平面化,追求“量”的积累。21世纪,在产业转型、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后工业时代,坚持后福特主义城市发展模式的东京,致力于城市更新,处于优化发展阶段的东京,利用东京2020年奥运会,城市发展多面而多维,追求“质”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其城市发展的内部矛盾也在不断变化中逐步加深。

疫情来临和奥运会决定延期之前,东京围绕2020年奥运会布置的城市发展项目,基本处于收官阶段,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业已成型的实体不会“蒸发”,但包括基础设施运营和维护问题在内的其他“非物质”内容,成为考验东京奥运城市综合治理是否可持续深化的关键点。东京既要完成防控疫情的艰巨任务,又要处理因疫情和奥运会延期带来的安保、营销、活动、商业谈判等问题,例如由奥运村改造而成的分售公寓因奥运会延期导致原定在2023年交房的

计划发生意外,东京都政府、东京城市开发机构、市民中的土地所有人和租地租房等权利相关人之间的沟通与协商,过程必然艰难。疫情和奥运会延期,为奥运城市东京的城市综合治理带来了极大挑战,但“危”与“机”往往一体两面,此刻,奥运城市东京各个领域的市政被紧紧联系在一起,密切合作,在一个不断转化和交换的城市系统中,跨界控制的能力需要不断提高。积极应对,有利于东京成为奥运城市的榜样,也为其良好声誉和形象大大加分,巩固其世界超级城市的地位和吸引力。奥运城市依靠高水平的城市政策导向、规划、制度和管理机制,为达成共识,依靠众多要素和适用制度间的相互作用和配合,将会让奥运城市的综合治理更加可持续。

5.2 奥运城市的办奥认识应该更加理性

许多奥运城市的申办报告、咨政文件及一些学术研究中,常常强调奥运会带来的单方面影响。但是,奥运城市举办奥运会而促进的大发展、大繁荣,单从外部环境上讲,往往寄于并行齐发的国内外方方面面向好的大趋势中,奥运城市很难单独因奥运会出现“奥运奇迹”。正如东京1964年奥运会、2020年奥运会都是时代变迁潮起潮落中澎湃的一朵浪花,“赌上国运”^[27]不应是举办国家、举办城市该有的办奥姿态。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塑造榜样奥运城市的背后,依托的是世界范围内新经济升级转型和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城市更新的兴起;1988年汉城奥运会塑造亚洲一流城市的背后,依托的是韩国各个领域的开放和文化振兴策略;早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举办前夕,如蒙特利尔一样的北美大湖区和圣劳伦斯河地区的其他工业城市,已经出现了增长停滞的迹象——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国际贸易竞争失利等信号纷至沓来。举办每届奥运会的奥运城市置于的是“全球性—特殊性—情景性”之中:既处于当时的全球时代背景,又处于某个举办国家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下,更与举办城市整个申办、筹办、举办和遗产存续的宏观、微观的思路和实践息息相关。2020年的疫情,更将全球性、特殊性与情景性中遇到的困难,叠加在一起。

日本及奥运城市东京,应真正务实地、主动地对原来的举办思路做出一些调整,以克服时艰。脚踏实地的将健康安全保障、民生保障、风险管理、减少额外费用等目标推到最前,将设定奖牌数指标、宣扬日本国力、营销等目标拉后。危机常态化之下,更不能用零敲

碎打、昙花一现的方法被动回应,更不能为奥运会举办而撑“面子”、丢“里子”。对于关心奥运会与城市发展互动的其他城市来说,两届东京奥运会的启发,体现在应该深刻理解奥运会的积极作用不是单独产生的,奥运会的消极影响也不会单独释放,奥运会的影响不应被过分夸大,奥运会无法解决全面性的、结构性的问题。因此,举办奥运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奥运会进行评估,更重要的是对全球性、特殊性、情景性的评估和判断,理性做出选择,举办奥运会是一种配合因素和辅助因素,而非决定因素。当举办奥运会所嵌套的整个局势或改革,与奥运会配合、共同指向可持续的、更好的方向时,真正的积极影响才可能被期待。

5.3 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大家庭之间应该更加团结

1960年代,一方是醉心高速发展,自身发展矛盾被压抑、面对体量尚可的奥运会满怀抱负的奥运城市,一方是固执于“理想国”夙愿,对奥运城市发展、媒介版权、商业开发等各方面时代进步予以回避的国际奥委会和介入程度有限的利益相关者,其中介是一个还没有踏入商业化运作逻辑的奥运会;21世纪,一方是需要审慎发展,自身矛盾越加突出,面对日益“臃肿”的奥运会力不从心的奥运城市,一方是“商业化在总部首脑决策中兴起”,希望“成为改革的领导者而不是改革的对象”的国际奥委会以及动机复杂的利益相关者,其中介是一个严重依赖TOP企业赞助和媒介版权赞助的奥运会。半个多世纪,确已是沧海桑田。

疫情导致奥运会延期,使奥运会相关各方之间的矛盾被放大,但疫情和延期的奥运会,也可能为矛盾的化解提供一个机会,因为愈演愈烈的矛盾中,最终没有真正的赢家。历史上低迷的奥运会申办趋势,发生在世界范围内存在较大风险和动荡的时间段(1920—19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70年代中后期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疲软等)。近年来夏奥会难以再现申办热潮,东京2020年奥运会接下来的每个举动,都会在目前各国、各城在方方面面因疫情蒙受惨痛损失的情况下,对2022年正式启动的2032年夏奥会举办城市申办产生影响,甚至影响更加深远——蒙特利尔1976年奥运会失利的阴霾依然未曾完全扫去,此外,东京的成败,也与巴赫主席任期的改革效果的评测息息相关。对于此次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东京2020年奥运会,其成功举办仅靠2020年东京奥组委、东京都政府和日本政府难以支撑。奥林

匹克大家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更需要空前的团结以应对困难,各方应该以各自利益的“小让步”换取整体利益的“不退步”。国际奥委会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之中的领导是否有力,协调是否得力非常重要。国际奥委会应该与2020年东京奥组委、东京都政府、日本政府共渡难关,积极对奥运城市东京施以更多帮助和鼓励。此外,从长远来看,以向举办城市倾斜为目的,调整奥运会的受益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以法律形式给予举办城市更多实际好处,探索对奥运城市体育等各方面公共事业、公共福祉的投入,也是国际奥委会可以考虑的一些未来的改革点。2018年11月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宣布从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始,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合同中将包括“人权标准”,相信不远的未来,奥运会不仅能成为奥运城市的催化剂,更能成为奥运城市的解语花。

6 结语

没有对历史的认识,则没有尝试推理的依据,正如日本东京大学前校长、环境公害专家和教育家小宫山宏的反复重申:“这并非日本和东京面对的问题,而是今后其他国家和城市、整个人类社会也肯定会面对的问题”^[19];没有对历史的认识,则容易流连表面而远离内在,抓住局部而忽略全貌,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短时间(事件)—中时间(局势)—长时间(结构)”的理论提示:历史重视时间概念,如同“电波”,历史也有短波、中波、长波之分,对某段历史“电波”的认识需要诉诸对更长历史“电波”的认识。东京举办1964年、2020年奥运会促进城市发展的比较与启示,倘若引发更多关于疫情背后危机常态化下奥运城市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思考,则萤火之辉,终将也能汇成“黑暗隧道尽头奥运圣火”之光。

参考文献:

- [1] ブルーガイド編集部. 地図と写真で見る東京オリンピック1964[M]. 東京:実業之日本社,2015:10-15.
- [2]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Games of the XVIII Olympiad. Th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1964 Olympic Games, v.1 [R/OL]. [2019-10-30]. <https://digital.la84.org/digital/collection/p17103coll8/id/272-49/rec/29>.
- [3][27] 原田宗彦. スポーツ都市戦略2020年後を見すえたまちづくり[M]. 京都:学芸出版社,2016:102.
- [4] The Japan Times Sports. Olympic construction transformed Tokyo [EB/OL]. (2014-10-10) [2020-05-01]. <https://www.Japan->

- times.co.jp/sports/2014/10/10/Olympics/Olympic-construction-transformed-Tokyo/#.XcCIujNKhPY.
- [5] AIZAWA, KURUMI, et al. Long-term impact of the Tokyo 1964 Olympic Games on sport participation: a cohort analysis [J].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2018, 21(1):86-97.
- [6]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 株式会社日本设计. 东京城市更新经验: 城市再开发重大案例研究[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9: 77, 132.
- [7][9][11] The Tokyo 2020 Organising Committee of the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The Tokyo Organising Committee of the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sustainability pre-games report and sustainability highlights [R/OL]. [2020-05-20]. <https://gting.Tokyo2020.org/image/upload/production/juykxnxjkk19msy wzad.pdf>.
- [8] 国土交通省. LRT(次世代型路面電車システム)の導入支援 [EB/OL]. [2020-05-01]. http://www.mlit.go.jp/road/sisaku/lrt/lrt_index.html.
- [10] 公益財団法人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競技大会組織委員会(東京2020組織委員会. 新しい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の発信地 臨海副都心エリアでの取組みを公表[EB/OL]. (2019-07-26)[2020-05-01]. <https://Tokyo2020.org/ja/news/news-20190726-01-ja>.
- [12][26] 皮埃尔·德·顾拜旦. 奥林匹克回忆录[M]. 刘汉全, 译.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8: 158, 170.
- [13][15] MURAKAMI WOOD, DAVID, et al. The aesthetics of control: mega event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Japanese urban order.[J]. Urban Studies, 2011, 48(15):3241-3257.
- [14] CHENG, SHEAUCHI, JOE R MCBRIDE. Restoration of the Urban Forests of Tokyo and Hiroshima Following World War II [J].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06, 5(4):155-168.
- [16] 周园园, 陈宇. 从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事件看横文彦和扎哈的城市设计观[J]. 城市建筑, 2020, 17(04):27-31.
- [17] 横文彦. 在新国立競技場案を神宮外苑の歴史的文脈の中で考える[J]. JIA MAGAZINE, 295:10-15.
- [18] 小川勝. 東京オリンピック「問題」の核心は何か[M]. 東京: 集英社, 2016: 18.
- [19] 杉本伸之, 清水拓. 東京未来地図2020 東京は、どのように変貌するのか?[EB/OL]. (2015-10-05)[2020-05-01]. <https://dentsu-ho.com/articles/3146>.
- [20] EDWIN A. WINCKLER. 全球疫情及其应对: 经济、安全及认同 [EB/OL]. 钱镇, 译. (2020-04-20)[2020-05-01]. https://news.gmw.cn/2020-04/20/content_33751880.htm.
- [21] KASIMATI 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Summer Olympics: a review of related research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5):433-444.
- [22][23] 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栏目组. 大国崛起·日本[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6: 198, 202.
- [24] ADRIAN PITTS, HANWEN LIAO. Sustainable Olympic design and urban development[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24.
- [25] KILLANIN L. President / Lord Killanin, Correspondence: 1972-1980[M]. IOC Historical Archives, Lausanne, Olympic Museum, 1973: 226.

The Impact of Postponed Tokyo 2020 Olympic Games on the Hosing City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Olympic city Tokyo

FENG Yanan, BI Tiany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Tokyo 2020 Olympic Games has been postponed for a year due to the global spread of COVID-19. As an Olympic city heavily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and the postponement of the Games, Tokyo should learn from its Olympic experience. This research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1964 Tokyo Olympic Games and 2020 Olympic Games on the Olympic city Tokyo's promoting its development by hosting the Olympic Games. It analyz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main objectives, major contradiction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nd stakeholders. For the Olympic cities th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should be more sustainable, the Olympic Games should be more rationally understood, and th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more united with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nd stakeholders.

Key words: The 2020 Tokyo Olympic Games; Olympic Games; The 1964 Tokyo Olympic Games; Olympics Cities; Urban Development.